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遮蔽的文明

陈绶祥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遮蔽的文明

陈绶祥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遮蔽的文明 / 陈绶祥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3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844-2

I. ①遮… II. ①陈…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6546 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遮蔽的文明

著 者 | 陈绶祥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杨红卫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0539-2925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6.5

字 数 | 404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44-2

定 价 |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学术教育并行，三者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前 言

《遮蔽的文明》一书收入了作者的专题研究文章三十篇，对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对与龙有关的文化现象，对面具与农业文明，对彩陶艺术、玩具艺术、建筑艺术、美术史等中华文化与艺术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具有独特见解的剖析和阐述。

作者陈绶祥先生是位博闻强记、见地不凡的中年学者。著名学者王朝闻先生曾评价他“有审美敏感，有比同龄人较丰富的知识，对学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从本书的目录也可以看出作者治学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其文章具有“精于学、邃于文、熟于事”的特点。作者性格宁静、淡泊，在研究中常以“无迹方知流光逝，有梦不觉人生寒”自励。作者在做学问或写文章中，持“大道如常、小技雕饰”的态度，用轻灵、平易的笔法，浅出深入地阐述他的艺术心得与见解。这在理论文章中可算是别具一格。此外，从行文中还可以感受到作者独具特色的幽默感，以及洞察问题的敏锐机锋。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展示了作者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仍在总体上体现了作者的学术风格与水平。我们将本书献给喜爱、关心中华文化与中华艺术方面的课题的读者，献给希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及关心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的读者。

目 录

前言 / 1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

——《吾文吾理》之一：《人性篇》 / 1

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

——《吾文吾理》之二：《开放篇》 / 16

一“指”禅随笔：指“一” / 26

一“指”禅随笔：道“二” / 29

中国绘画的物我观念 / 32

遮蔽的文明 / 37

中国龙 / 46

彩陶艺术研究 / 89

面具与农业文明 / 170

玩具的文化性散论 / 183

民间美术三论 / 191

祥云·卷草·如意

——佛教纹饰的中国化历程 / 197

中华建筑艺术与中华文化论纲 / 212

近大远小·以大观小·变时化空

——中国画透视刍议 / 225

写死·写真·写生 / 231

素描的“素描” / 240

朝闻先生美术史观之我见 / 254

新文人画论 / 272

今存顾恺之画论的辩名 / 297

现存魏晋南北朝画论考订 / 307

“六法”辨析 / 321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神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 334

魏晋南北朝美术史导论 / 370

折腾本已

——读陈玉圃画集代序 / 382

自强不息

——《中国中青年画家自选作品集》代序 / 386

不要忽视“创新”的传统

——“八十年代中国画展”观后之“乱弹” / 389

石鲁传代画序 / 395

朱屺瞻画序 / 397

《中华艺术丛书》跋 / 399

《三文丛书》序 / 401

后记：有梦不觉人生寒 / 407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

——《吾文吾理》之一：《人性篇》

原 序

主编盛情，再三约我撰文谈谈中华文化。

我性情闲散，好“迷”而不“作”，爱得“意”忘“行”，其实，都是难以提笔的托辞。况且本人又有“身在此山中”之癖而没能漂洋过海去“蓦然回首”一下来看看“老土”（只是故土的含义、以应时髦的心理需要），也没能到月亮上去“向前看”地望望“蓝色”的“地亮”（只是月亮的类比，以应时髦的“文化之光”），更缺乏那种可杀不可辱的“士气”，怕作了那叫做“鹄”的形象而被当作箭靶。后来，做了一个梦，终于在梦中上了天，入了地，也见了周公，也当了南柯太守。可见于名利仍未忘却，醒来便洒脱了许多。想想，反正早已活过了甘罗、王弼、王勃、李贺他们的寿数，还是“写了吧！”于是理了个总题目便信口开河，学着柴可夫斯基写《四季》那样应景作起“曲”来（只有不平不直的扭斜之含义），十二个月总得有一打篇目，于是搜肠刮肚，得曰：①人性、②开放、③变革、④志记、⑤哲理、⑥教化、⑦神灵、⑧纲纪、⑨权术、⑩性情、⑪艺文、⑫风俗。姑妄依次而言，并学林语堂先生那本“吾民吾土”的样儿，起了个总题目叫“吾文吾理”。仿佛郑板桥在唱“道情”（是真正的道“情”）。我的观点也许同很多人相悖，自视价值也正在于此。但我可不想抛“玉”引“砖”，也不想与谁“商榷”。

欧洲的圣哲们在将全部精力放在争论“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的时候（奇怪！至今我国还有不少新兴的“当代学者”认为这是非常高超且必要的“理性思维”问题），人便只能是上帝手中的“东西”或者“其他东西”上的“肋骨”了。整个西方十四世纪之前的“经院哲学”以及所统领的一切文艺、科学全是神的殿堂，那儿虽然每一个针尖上都布满了许多天使，但却没有一丁点儿人的立锥之地，那时，整个西方文明对人的认识可说是等于零。十四到十六世纪，西方先进的哲人们怀疑起神殿的构架来。于是，他们一如许多革命者一样，从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中找到了似乎是描绘人，其实是描绘神的“文艺”大纛，以“复兴古希腊文艺”的“复古面貌”，行摧毁“经院神学”的“创新行动”。于是，许多朴素的上古学问被发掘，被理解，被运用，被阐述。于是，便如“王弼注易老”那样在欧洲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六经注我”的运动来，我们便得以窥见了那个伟大的“人性”和“人道”的出现。最初，还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哲人们、匠师们接二连三地解释：“人是上帝创造的最佳范模”，“人体便是上帝的模样”。但是，一方面哥伦布和麦哲伦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另一方面，伽利略和布鲁诺却要被判刑和被烧死；一方面，培根升任大法官，另一方面，伏尔泰却被放逐。欧洲十八世纪的先知先觉，也只能在自然的认识上提出了实为“人的社会品质”的“平等、自由、博爱”作为人性口号，但他们对人的自身还是一无所获。而西方传统的“物化哲学”却在这种复兴中大展其能，那种“有一个支点便能撬起整个地球”的假说使得哲人们喊出了看似科学，实则荒谬的“人是机器”的口号，对神学的批判让给了对物的崇拜。随着钟表、玻璃镜子、万花筒和放大镜在西方文明中的泛滥，那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哲学只有“将人作物”似地把人体宰来割去，支、离、剖、度地研究起来，但“物”之“理”终于没能解说出“人”之“心”。于是，经典力学之父牛顿又回到了“神力”的万能中。新生的青年们在看腻了机械次序之后便逃逸到自然里面，高更不是在呼喊“你们留恋那个社会干什么，你们留恋那个将人当作机器的社会干什么”的同时，抛弃了万贯家财而只身逃到塔希堤岛去了么！尽管如此，“物”化之繁荣毕竟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身外世界，人们转了许多圈，认识了“人是工具”，“人是奴隶”，“人

是最精美的机械”，“人是高等动物”，“人是由猿变来的生物”等等许许多多的道理，但是，它们又如隔靴搔痒似地更激起了人们对“人”那个“自身本质”的兴趣。马克思总结了一个时代的认识和发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似乎摸到了些什么，但又似乎还是没有摸到。定型化产品的流通价值，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伊甸园，经院哲学的逻辑思辨，构架了一个牢固的理论三角形，然而，就其本质上也正如马克思所言，它们只在“就其现实性”上框架了人生。于是，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又在故去的圣哲那儿找出了新的发展来：生物学家与细菌学家研究每一个细胞的经验，难道不可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借鉴来做一个个大小社会的考察；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每一件物体以至分子、原子的运动，难道不可供生态学家和病理学家借鉴来做一项项事例的剖析；数学家的思维可使世界建立在“逻辑原子”身上，革命家的经验可作为世界结构的“实用哲学”。于是，西方文明花园中也出现了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孟德尔与弗洛依德，摩尔根与佛洛姆，科学家也好，神父也好，在做又一次“致广大，尽精微”的对人的探索，但不无遗憾的是，在他们认知、判析、推演、总结的整个过程中，“人”仍然是一个分离着而按一定构成方式联络起来的“物质”，或者是一类联系着而按一定顺序变化方式分开来的“分子”，或者是某些自然法规和社会关系造就与限定的“东西”，说到底，人还是物，只不过是自然产物与社会生物。然而可喜的是，对人自身的剖析在新的世界中带来了新的希望，对自身的深入理解否认了原来的自身。文艺家与西方现代哲人们一道冲击了以往西方文明中对人的一切认识，他们从人的情感与人的思想所创获的信息符号中去解读人的自身。毕加索愤愤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老要问我的画是什么意思，而不去问鸟儿们唱歌是什么意思。”马蒂斯不无幽默地对那些指斥他画的妇女太丑的贵妇们说：“我是个画家，画家不创造女人，只创造图画。”马格利特在他那巨大的悬在空中的烟斗画幅上反复书写“这不是烟斗”来作为他的座右铭。艺术家们并不孤立，超现实主义运动一开始便有文学与哲学的介入，表现主义与前卫主义、波普艺术也绝不是文艺单独的事情，克罗齐与席勒、罗素与怀特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等许多

哲人们虽然依旧用数字、用逻辑、用现“象”、用符号来诠释、理解、判断人生，但这些对象本身并不再是度物所定的结果，而已变成人思所得的“文”“志”，不再是物运所规的“定则”，而已变成了人历所获的格“律”了。于是，在又一次“个性”、“自我”的解脱中，实质上已不再讨论那种与“人性”无关的“个体”“典型”等问题，而直指“人”“生”的精义。萨特等许多西方哲人们终于画出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的巨大问号，这才是关于“人”“性”的千古隐谜。只有至此，“人”才从自然中、从社会中、从自我中彻底被窥见而成为世界之基石。西方文明熏陶下的智者，在追求自身表现的过程中才明白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至理，终于将人构置在自古以来西方文化认为的最稳定的三角形中最重要的底边上，“自然·社会·人”成了新兴的宇宙框架，成了新兴的学术对象，成了新兴的艺术题材，成了……总之，“人”成了沟通其他二者之桥，如同中国太极图中那“S”形的一“道”象征的“人”的含义那样，既分割了阴阳之数，又联系了阴阳之道。当然，也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与认识的区别，它们才形成了：一个在极端上的限制的连接；另一个在整体中无处不在的运动着的连接。一个在只有横着向极端方向延伸的扩展，这种扩展使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距离增大，而只有将人与自然、社会压缩到一个逻辑上的“点”时，它们才统一起来；另一个却在任何方向上随着自然社会的拓展而改变自身的量数与大小，却又不改变其形状与特征，无论自然、社会、人如何地放大缩小，它们统一的至理是一统的。这也许要涉足于许多基本哲学观念才能更深入地讨论下去，但无论如何，只有在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完善构架才开始形成。于是才明白了：整个宇宙是建立在人的认识基础上的自然与社会。“自然·社会·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但我们谁曾知道，就在西方文明认知这个“人的宇宙”构架之前多少个世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将这种构架以自己理解的文化形式，以中华固有的精辟方式书写成“文”，粘贴到了每一户农家的“香火台”上，当成了高于祖宗牌位的“民族正神”呢？

不是吗？有史籍可稽，至迟自宋代开始，中国百姓们就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了。那时的百姓不懂“现代汉语”，也没学过《自然课本》与《社会学讲

义》，但我们谁能否认，“天地”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君亲”即指政权与家庭，它就是在西方社会学的严密构架中也是无懈可击的“社会”之注脚；而那中国的做“人”的标准，便集中在“为人师表”的“师”身上，这不俨然就是“自然·社会·人”的具体说明吗？

有些人会抬出“又是古已有之”的不满来。其实，“古已有之”并非是什么坏事，文化既是人们对宇宙认识的理念记录，人们只要记录了这些认识，它便会成为文化留在人类历史之中，这是什么坏事呢？真正的坏事恐怕是“现在没有”吧！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当然是“古已有之”的，而且还“古”得很呢！

半个多世纪前，被骂为“洋奴文人”“假洋鬼子”的林语堂先生在他今天已重印并风靡世界的《吾民吾土》与《生活的艺术》等著作中娓娓动人地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他从衣食住行、艺匠工巧、婚丧嫁娶、声色犬马、诗文歌舞等许多信手拈来的事例中，弘现了中华文化作用于人生的真谛，指出了中华文化是让人懂得生活艺术的这一主旨。

我当然不愿再重复这些常谈，时过境迁的事例可以屡举常鲜，层出不穷。但“为人”的目的确会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认识，理念本身并不需借助事物来阐述，而事例总是反、正都有，也并不证明任何理性认识，这便是中华文化对“文”和“行”的基本态度。就是在“为人”这一词汇的本身，也反映出中华文化对人的普遍认识来。读成平声的“为人”，便是“做自己”，而读成去声的“为人”，便是“帮别人”，“做一个人就是要为了人”，至理名言！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它积淀了多少深刻、平凡又精练的对“人”的理解啊！

这不是附会，更不是牵强。从一脉相承的文化履迹中，我们不难明白中华文化这种为人的根本。远在文字尚未统一之前的春秋时代，孔老夫子就以其“仁爱”哲学鸣世，而“仁”的根本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爱人”。他的后学孟轲承其衣钵，其宗旨全是“讲道德，说仁义”，自此后的儒家学派，无不推崇“民本”“民贵”“民重”的思想，汉代崇尚孔子学说，其中心也是将“人”的地位提到“自然”与“社会”的框架上去，“天人感应”也好，“纲常伦理”也好，其本质仍是在“自然·社会”的认识中寻找“人”的自身。学说，不是只靠倡

导便能实行的，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随意毁灭的。秦始皇烧掉的书许多都流传下来，而秦始皇不烧的书，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焚书也是如此。儒学所以作为中华正统文化被尊崇，不正是它自身与中华文化有至密切的联系，同时又道出每一个“人”的“人性本质”所致吗？

我们可以咒骂孔子，歪曲其理论来解脱我们自己的困窘，但是，在孔子没有诞生之前，中华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何况文化的至理还可追溯到文明之前。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表现在文化自身的产生、作用、目的都是以“人生”为始终。

中国是在原始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社会，再加上天造地设之自然条件，赋予了中华文明“为人”之本质。

与原始狩猎经济方式不同（欧洲原始文明大抵如此），原始农业与原始采集经济的活动方式是以定居、集群活动为特征的。其个体的劳动方式又是和缓而相对自由的，主动而相对平等的。采集、耕作、收获、储存活动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是一种对于原始人类个体来讲相对安全独立的劳作。这与狩猎活动中对个体力量的强调不同，也与狩猎活动中那受制于猎物的被动劳动不同，还与那种随时可获取或失去生命的斗争、及时享乐与忍饥挨饿的生活方式不同，因此，原始农业经济造就的是一种总体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自由个体。在平等而自由的主动劳动中，每个个体的活动参照系很早便建立在自然与其他个体身上。这已足以萌发那种自在而又不排他，独立而又相依存的原始认识，并导致这种群体的规则与个体的宽容，集群的制约与个体的独立的原始心态。每一个群体在共同的植物生长规律与土地限制的前提下，受制于自然；每一个个体在自然规律限定下的活动中又必定与其他个体共存而受制于集群意识。因此，每一个“人”在自觉的同时，也正是“他觉”的同时，每一个集群在“社会”的同时，便也正是“自然”的同时。因此，在其生存方式的原始信仰中，已将自身、他人、自然化入，当人们要从这种混沌之中以理念方式记录出他们的认识时，他们所选择的“文”必定要“志”入他们自身的感受，要“化”入他们所从来就处于其中的“自然”与“社会”。他们只能以自己作为自然与他人的参照，他们也

只能以自己所理解的“自然”与“他人”作为自身的参照。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地球上已知的原始古文明区域（大都沿河流两岸而滋生），只有中华民族这两条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是东西走向的，只有这两条河流流经的区域是处在四季分明的气候带中，它们的运行方向，正是地球自转的方向，它们生命的节奏，正是地球运动的韵律。在此范围内，有着同一的“天”“地”，人们随日、月、星、辰之起落，朝暮寒暑之往复，实行着春种秋收的生活，认识着阴阳运行的至理。因此，虽然每一个个体的参照物都是自身，但任何一个自身所必须遵循的生存方式都使他们的认识统一，这种认识的结论，不正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天造地设”的趋同之大势吗？那些把长城当做靶子的“黄色文明”的咒骂者们又何曾想过，在长城构筑之前，这块土地早已产生了有文明记载的趋同文化。正是这种每个个体自觉的趋同特征，才使得中华原始文明选择了自身——实际上是选择了统一的“自然·社会·人”中的“人”作为文明的参照系，这便是中华哲学的本质——人的哲学。以“人”的感觉、经历的记志发展成“文”的理念记录，上升成对世界的整个认识。感觉永远不能用尺度衡量，履迹永远不应该用规矩制定。不然，先秦诸子就不会那么起劲地挖苦“刻舟求剑”的楚人和“信尺疑足”的郑人；中国的老百姓也就不会将“守株待兔”、“削足适履”、“掩耳盗铃”、“揠苗助长”等典故津津乐道几千年；中国也就不会出现老子庄子那种“感觉型”的哲学大师，汉语词典里也不会有“江山如画”（注意：不是“画象江山”）的词条了。

我们只要看看汉字中“历史”这两个字，便不难明白，中国的哲学是如何从“人生”中着眼而产生的了。在现代汉语中，人们爱将“历史”二字并称。实际上，“历”字在中国最初并无“史”的含义，从道理上讲，“历”字的出现要比“史”早得多。“历”字，从甲骨文到现在几乎都写作“歷”（唉！我们那些搅乱文字的混文化饭吃的先生们为了“少写几笔”，却多了几千个“简化汉字”，实在是“繁化”“复杂化”和“混乱化”啊）。甲骨文中已发现许多“历”字，其基本写法已完全定型，均写作“𠄎”或“𠄎”，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对“历”的基本观念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上面的“𠄎”或“𠄎”，不言而喻，是指庄稼林木之属，并排书写两个符号表示对“类”的归纳，颇有“一